

世界怪异小说文库

畸情篇

SHI JIE GUAI YI XIAO SHUO WEN KU



四川文艺出版社

目录

1

地道

〔阿根廷〕埃·萨瓦托

被致命的孤独所困扰，被畸型的情欲所驱使，画家苦苦追寻知音与爱情，最后却亲手把唯一能理解自己的情妇杀死，最纯洁的爱导致了最疯狂的恨……

105

伤心咖啡馆之歌

〔美国〕卡森·麦卡勒斯

新婚之夜，强悍的新娘将追求自己多年的新郎赶下床，却对矮子驼背表哥一见钟情，为讨他的欢心，开了个供全镇居民寻欢作乐的咖啡馆。犯罪假释归来的新郎找她报仇，表哥却迷上了新郎。新郎和新娘为争表哥决斗，表哥却帮新郎将她打倒，捣毁咖啡馆，然后二人远走他乡，剩下她缩回小楼避世隐居。三个追求者轮番倒转成为虐待者，伤心咖啡馆演出了畸型人性的一出悲剧！

177

棉被

〔日本〕田山花袋

为生活与妻小所累的中年教师，苦闷中暗恋上了寄宿于自己家中的纯情的女学生，而她却有另一位心上人。因此，当她离去时，他只有埋首于她曾睡过的棉被中，哭泣着，尽量地去嗅“那女性的可爱的油香与汗气”！

235

一个荡妇的自述

〔日本〕井原西鹤

春夜把酒谈心，老妓向客人倾诉自己放荡的一生：“我也是从花蕾之年，情窦初开之后，经历了种种污浊的恋爱，终至身败名裂。如今嗟悔何及！……”

〔阿根廷〕 埃尔内斯托·萨瓦托

地道

……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一条漆黑、孤寂的地道：我所在的地道。

1

可能一说我就是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就是那个杀死玛丽亚·伊里瓦内的画家，大家便明白了，因为我想那个案件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对鄙人的情况无须赘述。

恐怕连魔鬼也不晓得世人会记忆些什么和为什么要记忆。实际上，我一向认为，并不存在什么集体的记忆力。这大概是人们的一种辩护方式吧。“今不如昔”这句话并不意味着过去发生的坏事少，而是说坏事已被人们所忘却（这是值得庆幸的）。当然，这种话并没有普遍意义；比如说我吧，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善于记住坏事，因此，若不是我感到今昔

同样可怕，我可能会说“昔不如今。”许许多多不幸的事，许许多多无耻而冷酷的嘴脸，许许多多粗暴行为都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因而，对我来讲，记忆宛如一束令人望而生畏的灯光，照亮了一个污秽不堪的耻辱博物馆。我常常在画室幽暗的角落里读完报纸上警务栏里的消息，垂头丧气地发呆。这种情形发生过多少次啊！然而，事实上在那一栏里登出的并非总是人类最丑恶的东西。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讲，有些罪犯还是比较清白无辜的人，并非因为我杀过人才这样讲，这的确是我的一种始终不渝的信念。某人是坏蛋吗？那么除掉他就万事皆休了。我把这称之为行善。请诸位想一想，如果此人为非作歹，人们不除掉他，反而试图用写匿名信、谩骂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卑劣手段来对付他，这会给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啊！至于我本人，坦白地说，我现在很后悔当初没有充分利用有人身自由的机会消灭六、七个我认识的这类家伙。

人世可畏，这是一条无需证明的真理。仅举一例便可说明这一点：在一个集中营里，有一位前钢琴家常常抱怨挨饿，于是，人家就强迫他吞食一只老鼠，一只活生生的老鼠。然而，我现在要谈的不是这件事，如果有机会，以后我再详细叙述关于吃老鼠的事。

2

我已说过，我叫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人们可能要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我写自己的犯罪经过（我不知是否说过要讲述自己的罪行），特别是，为什么找出版社出版。我很了解人们的心理，我想，别人一定会认为，我这样做是出于虚

荣。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这都无关紧要；我刚才说过了，我不在乎别人的议论和评价。让他们认为我把这段经历公诸于世是出于虚荣吧。但是，归根结底，我和别人一样，也是个血肉之躯，我觉得人们要求我具备特殊的品质，而且只要求我一个人，这是极不公平的。常常有人自以为是超人，但最终他会发现，自己也是个碌碌之辈，下流无耻，而且背信弃义。关于虚荣心我不加评论：我认为人人都具备这一推动人类进步的巨大动力。那些处处摆出爱因斯坦等一类名人的谦虚架势的先生们，实在令人好笑。我的回答是：谦虚易在成名时；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人貌似谦恭。即便当你认为虚荣决不存在的时候，你也会突然发现它的最微妙的形式：出于虚荣的谦虚。这种人我们碰到过不知多少！甚至连基督这样的人，不管他是真人还是象征，也说过出自虚荣心的话，或者至少说过傲慢的话。莱昂·布卢瓦^①曾反驳那些指责他傲慢的人说，他一生都在为许多远不如他的庸人效劳。那么，他对自己这番话又该做何解释呢？虚荣存在于所有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包括在仁慈、自我牺牲精神以及慷慨大度之中。小时候，每逢想到母亲终有一天会死去，我心中就很难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明白，死亡不仅可以忍受，甚至可以给人以激励）。当时我不相信母亲也有不足之处。现在她不在人世了，应该说她是最善良不过的人了。但是，我也记得在她晚年的时候，我怎样开始痛苦地发现，在她美好的行为后面也隐藏着些微的虚荣和自负。那时我已长大成人了。另一更为有力的证明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当时我母亲做了癌

① 莱昂·布卢瓦（1846—1917），法国小说家和散文家。

切除手术。为了及时赶到她那儿，我日夜兼程，整整两天两夜未合眼。当我站在她床边时，她垂死的脸上露出一丝慈祥的笑容，并且嘟哝了几句怜悯我的话（她竟对我的疲劳表示怜悯）。于是，因为自己飞快地赶到这里，我心中不免隐隐生出一种虚荣的自豪感。我供认这一秘密，无非是要诸位看到，在很大程度上，我并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强。

尽管如此，我讲述这段经历却并非出于虚荣，或许我准备承认含有某种自负或傲慢的成分。但是又何必非寻求一切生活现象的答案不可呢？当我开始写这段经历时，就决计不做任何解释。我仅仅想讲出自己的犯罪经过，如此而已。谁若不喜欢就别看。但是，我不信他们不愿看，因为，正是那些一贯爱寻根问底的人好奇心最盛；我想，他们谁也不肯放过读一本完整的犯罪故事的机会。

我原本可以对写这份自供状的动机含而不露；但是，我无意让别人说我性情乖戾。因而我要说出真情，无论如何，真情十分简单。我认为会有许多人读此书，因为我现在名声在外。虽然我对大至全人类、小至本书读者都不存太多的幻想，但是，仍对得遇一位知音抱一线希望。即使一个人也好。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此书会有那么多人读到，怎么仅仅是一线希望呢？”我认为这类问题提得毫无意义。尽管如此，仍须预见到它的出现，因为人们常常会提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而只要稍加分析，便会发觉这种提问毫无必要。我可以在有一万俄国人参加的大会上讲话，直至声嘶力竭，大概不会有人理解我。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曾经有过一个能理解我的人，而她恰恰是我杀死的那个人。

众所周知，我杀死了玛丽亚·伊里瓦内·翁特尔。但是，我是怎样认识她的，我们之间的确切关系如何，以及我怎样产生杀死她的念头等等，却无人知晓。我将尽可能公正地讲述这一切，因为，我虽由于她的过错而吃尽了苦头，但并不执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完人。

我在“一九四六年之春沙龙”^①摆出一幅画，题为《母爱》。这幅画与我过去的许多画风格相同：正如评论家们用那令人生厌的行话所说的一样，这幅画结构严谨，布局合理。一句话，此画拥有那些夸夸其谈者一向可以在我的画布上找到的特征，甚至还有“某种深刻的思想内涵”。在画幅左上角，通过一个小窗口可以看到不大的远景：一片幽静的海滩和一个眺望大海的女人，她似乎在期待什么，也许是等待远方一声微弱的呼唤。我认为，这场景表现出一种绝对的孤独，而且含有某种不安。

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场景：人们把它当作次要点，大概当成一处点缀，目光从那上面一扫而过。看来，除一人之外，再也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场景正是本画的精华之所在了。一位陌生姑娘停在我的画前，伫立良久。看起来她对前景中那位看着孩子玩耍的伟大女性并未注意，相反，却目不转睛地凝视那背景上的小窗口。我可以肯定，她在盯着画面的时候，已经完全置身于尘世之外：她没看见从我的画前走过或停下来

①：阿根廷每年9月21日开幕的全国美术雕塑展览会。

的人，也没听见别人在说什么。

我一直焦灼不安地望着她。后来，她消失在人群中。与此同时，我却踌躇着，一方面迫不及待地想叫住她；另一方面又感到无可遏制的胆怯。我怕的是什么呢？也许这种胆怯类似于在一场赌博中不惜倾家荡产而孤注一掷时的心情。然而，在她走掉之后，一想到她已消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千上万的陌生居民之中，从此再也见不到她了，我不禁感到懊恼和晦气。

当晚，我焦躁不安地回到家中，心情沮丧，闷闷不乐。

以后，我每天都去展厅，一直到闭幕。我呆在画幅附近，从那儿可清晰地辨认每个停在我的画前的人。但是，她再也没有来。

一连几个月，我一直思念着她，盼望能有机会再次见到她。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这幅画完全是为她而作的。仿佛那窗口的小场景开始膨胀起来，渐渐侵入整个画面，占据了整个作品。

4

一天下午，我终于在街上看见了她。她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匆匆地走着，像那种必须在预定时间到达预定地点的人。

我立即认出是她。即使在杂乱的人群中，我也能认出她来。我激动得无法形容。几个月来我一直思念她，想过许多，现在看到她却又不知所措了。

实际上，我曾反复思考和筹划过一旦遇上她时如何行事。我大概说过，我这个人胆子很小；所以，对于能否碰见她，碰

上又如何行事，我曾翻来覆去地想过。假若一旦相遇，一个不可避免的最大障碍就是搭话的方式。我认识许多男人，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同素不相识的女人搭讪。坦率地说，我一度很嫉妒他们。我并非好色之徒，也许恰恰因为如此，我才为错过了几次同女人交好的机会而惋惜。也仅仅在这为数不多的机会中，我才摒弃了女人与我无缘的想法。不幸的是，我同任何女人都无缘是早已命中注定了。

在设想那些相遇的时候，我分析过各种可能性。了解自己的性格，知道一旦出现突如其来、出人意料的情况，我会因手足无措和胆怯心虚而蒙头转向。因而我事先准备了几种合乎逻辑、或至少是切实可行的应酬办法。（一个人寄匿名信侮辱他的挚友是不合逻辑的，但大家都知道，这是可能的。）

看来，姑娘是经常出入于绘画馆的。如果能在某个展厅遇上她，我就靠近她身边，不用费多大劲，便能够就展出的画和她攀谈一番。

经过反复琢磨，我撇开了这种设想。以前我从来不去绘画馆。一个画家这样做，大概会令人感到奇怪，然而，实际上却解释得通。而且我相信，假如我决定去绘画馆，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不无道理。当我说“所有的人”时，也许有点夸张。不是“也许”，肯定是我言过其实了。经验告诉我，在我看来清楚明白的事物，周围的其他人几乎从来都不这样看，我现在很烦躁，每每对我的行为做出辩解之前，优柔寡断，结果往往是把话闷在心里，缄口不言。这正是我直到今天才决定讲述我的犯罪经过的原因。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是否有必要详细地叙述关于画展的情况。但是，我如不提及此事，只怕人们会以为我的行为是纯粹的癡狂症，尽管我确实有极

其充分的理由这样做。

做这件事的理由的确很充分。首先我要说，我憎恶一切组织、宗派、社团和行会。总之，我憎恶那些由于职业、爱好或是相仿的怪癖而聚在一起的丑类。这种人有许多可笑的特征：都是一路货色，讲行话，有虚荣心，自以为高人一筹。

看来问题变复杂了，但是，我找不到简化它的办法。此外，不想继续读这本书的人也就不必勉为其难了。我直言相告，诸位可以悉听尊便。

我说的“一路货色”是什么意思呢？诸位也许有过这种体会，当您碰见一个歪嘴或总是眨巴一只眼的人时会感到多么丧气。但是，所有这样的人集中在一个俱乐部里会是怎样的情景，诸位想过吗？当然，没必要把事情想得那么极端。只需观察一下人口众多的家庭就行了，这种家庭的成员中总有点共同的特征，相同的表情，或近似的声调。我爱过一个女人（当然，是单相思）。当要见她的姊妹们时，我吓得躲开了。因为以前我遇到过一次这类可怕的事：我在一位姑娘身上发现了非常惹人喜爱的特征，但认识她姐姐以后，我一度很泄气，并觉得羞愧。原先姑娘身上使我赞赏的特点，在她姐姐身上却被夸大而走了形，丑化了。除此之外，姑娘的形象在她姐姐身上被丑化还使我产生了一种羞愧感，好像对那位姐姐丑化了我十分爱慕的姑娘一事，我也负有某种责任似的。

也许由于我是画家的缘故，我发现常人是关心家庭中的这类丑化现象的。应该补充一点，这有点像某些画家，他们专事模仿某绘画大师，比如那些可怜巴巴的模仿毕加索的画家。

此外，还有行话，这是我不堪忍受的另一件事情。只要

举下面几个例子就足够了：心理分析学、法西斯主义、新闻报道。这些我都不喜欢，我讨厌这一切。

就拿“心理分析学”作例子吧。普拉托大夫才华出众，我把他当成自己的知心朋友。当所有的人都开始折磨我时，他竟然也同他们站在一边，这伤透了我的心。还是不提这些吧。有一天，我刚到他的诊所，他便对我说他要出去一趟，并邀请我同行。

“去哪儿？”我问。

“去参加协会举办的酒会，”他答道。

“什么协会？”我不无讥讽地问，因为我对这种在专用名词前加定冠词的习惯很反感：比如心理分析协会，共产党，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等等，前面都要加个定冠词。

他大惑不解地看着我，我也故作天真地瞅着他。

“就是心理分析协会嘛。”他那双敏锐的眼睛盯着我，回答说。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家们认为他们的职业要求具备这样的眼睛。此刻他似乎在询问：“这家伙又出什么怪点子？”

我想起刚刚看到的关于一位叫贝尔纳特或是贝尔特兰德的大夫主持什么会议的消息。虽然我明明知道不是这个协会，却故意问他是否这个协会。他带着一丝轻蔑的微笑看看我。

“那都是些吹牛大王，”他说，“唯一得到国际上承认的心理分析协会是我们的协会。”

他转回办公室，在一个抽屉里翻了一下，最后拿出一封英文信件给我看。出于礼貌我看了一眼。

“我不懂英文，”我解释说。

“这是芝加哥来的信。信中承认我们为阿根廷唯一的心理分析协会。”

我装出钦佩和十分尊敬的样子。

随后，我们走出来，驱车赶到协会。那儿聚集了很多人。有些人我能叫得出名字，比如格登贝尔克大夫，他近来名声大振。由于他试图治愈一名妇女，便让人把他同那妇女一齐送进疯人院。他刚刚出院。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并不觉得他比其他人坏，甚至觉得他更安静，也许这是关在疯人院里的结果。他夸奖我的画，这一来，我反倒明白了他讨厌那些画。

一切都十分典雅。因此，我开始对自己这身旧衣服和膝盖上的补丁感到脸红了。不过，这不是使我难堪的唯一原因，还有一个说不上来的原因。当一位苗条的姑娘递给我几客三明治，同时和一位先生谈论着什么性欲狂的问题时，我的难堪达到了极点。大概是因为这些衣冠楚楚的太太先生在这些洁净、舒适而又时髦的家具中间讲着性欲狂一类的字眼让人感到不伦不类吧。

我想躲进角落里去，然而却无处躲藏。大厅里挤满了人，全都不停地谈论着同样的题目。于是我只好逃到街上去了。当我同普通人呆在一起时（一个卖报人，一个孩子，一名司机），我突然觉得在一间大厅里有那么一大堆人真是莫名其妙。

但是，在所有各种协会当中，我最讨厌的是画家协会。当然，部分原因是我最了解它。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对他了如指掌的东西最有理由感到厌恶。但是，我讨厌画家协会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讨厌那些评论家。这是我一直无法理解的一个灾难。假如我是一个著名的外科大夫，而另一个从未摸过手术刀的先生，既不是大夫，又丝毫不懂医术，却来对我手术中的缺点评头品足，您会怎么想？美术界也同样。奇怪的

是人们却未发现这一点，尽管他们对那些大言不惭的医学评论家嗤之以鼻，却过分敬重美术界的摇唇鼓舌之辈。如若某个评论家也能画上几笔，哪怕是些蹩脚货，那么听听他的意见倒也无妨。但是，即便如此，也是荒唐的，因为，一个蹩脚画家去对一个杰出的画家说教，怎么合乎情理呢？

5

我一直举棋不定。这是我的坏毛病又在作祟，因为我总想给自己的每个行动找出正当理由。有什么鬼理由解释我不去看画展的原因呢？我觉得每个人，只要愿意，都有权利去或不去看画展，没必要长篇大论地摆理由。否则，这坏毛病能引出什么好结果呢？然而，尽管我还能就画展的事说上许多，比如：同行们的流言蜚语啦，公众愚昧无知啦，负责筹办展览和布置展厅的人愚蠢啦，等等。但是，说到底，这些都已成为事实了。好在（或者说“幸亏”）我对这一切都已不感兴趣了；否则，我也许会写一篇冗长的评论文章，命题为《画家应谨防美术界同仁之方式说》。

应该放弃在画展上碰到她的可能性。

也许有这样一种可能：她的某个朋友同时也是我的朋友。这样，只需简单介绍一下就行了。我被这不光彩的怯懦想法迷住了心窍，兴奋地绞尽脑汁思考着。一个简单的介绍！一切都变得轻而易举。太好了！我当时头脑发热，看不出这个想法的荒谬之处。没有考虑到找一个她的朋友，同找到她本人一样困难，因为，显而易见，我连她是谁都不知道，要找到她的朋友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假如我知道她是谁，那

还有什么必要找个第三者呢？当然，别人介绍也有一定的好处，我并不轻看这一点，但是，很明显，关键问题是要找到她，然后再千方百计找一个共同的朋友给我们做介绍。

与之相反的路子是看看在我的朋友中有谁碰巧也是她的朋友。这样就不必事先找到她了，只要向我认识的人打听一下，有个姑娘身高多少多少，头发如何如何，就行了。可是，我又觉得这是一种轻浮的行为，便放弃了：一想到要向马培利或拉狄盖这种人打听此类事我就感到羞耻。

我最后决定，不管这个办法多么荒唐也不放弃。我之所以认为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在前边已经讲过了。当然，可能有人 would 认为，设想我的熟人同时又是她的朋友，这本身就有点荒唐，因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想法太肤浅，一个惯于思考问题的人决不会这么想。然而，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的阶层，它们各由兴趣相仿的人组成。在这些阶层中，偶然的相遇并不罕见。我就曾在柏林的一条街上碰见过一个人，后来在意大利的一个偏僻的小地方又遇到了他，最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书店里再次见到他。把这几次相逢归结为巧合能讲得通吗？我说的是很平常的事：任何一个爱好音乐的人，喜欢世界语的人，笃信巫术的人都清楚这一点。

但是，我仍必须考虑到最可怕的结果：在街头相遇。有些男人不知怎么一来就能拦住一个女人，同她攀谈起来，甚至引出风流韵事。我彻底放弃了主动搭话的打算。我对这种街头交往一窍不通，加上我貌不惊人，最后还是做出了这消极的决定。

我只有等待她主动来搭话。这种机会可谓千载难逢。因

此，我将自己的幸福押在了一场希望渺茫的赌博上了。在这种赌博中，必须赢一次才能取得再赌的权利，而只有赢了第二次才能获奖。实际上，我必须先找到她，然后才谈得到她跟我搭话。我感到沮丧，失望，头脑发胀。不过，尽管如此，我仍旧继续思考着应采取的方式。

于是，我幻想着她先同我说话。比如，她向我问路或打听公共汽车站。关于这个话头，我一连几个月搜肠刮肚，愁眉不展，焦躁不安，全力以赴并满怀希望编了一连串不同的回答。有时我设想自己能言善辩、说话滔滔不绝（实际上我从来不是这种人），有时又十分拘谨；有时我还想象自己十分和蔼可亲。最不正常的是有时我竟粗鲁地回答她的问话，甚至发火（在我设想的相遇中）；有时由于我无缘无故地发怒，粗野地骂她，责怪她问我一些没有意义或未加思索的问题，结果一场相会不欢而散。我往往因此而痛苦万分，一连几天责备自己的愚蠢，责备自己失去了同她建立关系的一次可贵的机会；幸亏，我最终意识到这一切不过是想象中的事，真正建立关系的可能性依旧存在。于是我重新鼓起更大的热情，想象着新的、更有效的街头交谈方式。一般说来，最大的困难莫过于把她的问话同抽象的艺术，或退一步讲，同我的画中的小窗口留给她的印象联系起来。因为这些东西太抽象，与日常生活相距甚远。当然，如果在时间充裕、不慌不忙的情况下，这样的联系还是可能的，并非完全不合逻辑。在社交场合，时间绰绰有余，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场合适于通过一些毫不相干的事物建立联系。但是，很显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熙来攘往的街道上，在乘坐集体计程车的人中间，在行人的裹挟中，这样的谈话几乎不可能实现。不过，话又说

回来了，只要我还没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就不能放弃这种努力。于是我又重新想象着直率而又卓有成效的交谈方式：从“中央邮局在哪儿？”这句话开始，直到讨论起有关表现派或超现实主义绘画的问题为止。当然，一切都并非轻而易举。

在一个失眠的夜晚，我得出一个结论：做谈话的这种准备感无多大用处，又太伤脑筋，还不如孤注一掷，大胆提问，开门见山。比如，就问她：“您为什么只盯着那小窗口？”夜晚失眠的时候，一个人往往比在白天更容易下决心。第二天，当我冷静地分析这种可能性时，我的结论是我没有足够的勇气脱口问出这样的话。同往常一样，怯懦使我走到另一个极端；我开始构思一种间接的提问方式，例如：“您对艺术感兴趣吗？”这种提问要想触及到我所关心的问题（小窗口），还需经过很长时间的交往才行。

我记不清思索过的交谈方式有多少了。只记得有些办法太复杂，根本不实用。不知锁头怎样，就想用一把事先准备好的钥匙打开现实的大门，这种巧合大概太罕见了。但是，当我反复推敲这些迥然不同的谈话方式时，常常把回答搞混，弄得颠三倒四，就像一个人在脑子里回想走过的棋局一样。我还常常把各种不同的交谈方式里该说的话张冠李戴，结果很可笑，也很可悲。比如，我叫住她，告诉她一个地址，立刻又问她：“您对艺术很感兴趣吗？”这简直莫名其妙。

每当出现这类情形，我就好几天停止胡思乱想。

6

一看到她在对面人行道上走着，各种准备好的话都一股